

贵州地域文化的理论建构

——读蔡熙的《“多彩贵州”的文化蕴含研究》

齐林华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西 南昌 330103)

[摘要] 蔡熙博士《多彩贵州的文化蕴含研究》一书,从贵州文化的异质性、贵州文化的多元性、贵州文化的反思性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多彩贵州”的地域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与学理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多彩贵州的文化蕴含研究》;贵州;地域文化;文化异质性;文化多元性;文化反思性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4-0123-03

Theory Construction of Guizhou's Regional Culture

——On Caixi's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olorful Guizhou

QI Linhua

(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 Nanchang, 330103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olorful Guizhou*, a book authored by Dr. Cai Xi, conducts an in-depth inquiry in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olorful Guizhou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ic way,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heterogeneity of Guizhou culture, diversity of Guizhou culture and reflexivity of Guizhou cultur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olorful Guizhou*; Guizhou; regional culture; cultural heterogeneity;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reflexivity

从地域文化维度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造就了迥异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文化记忆、文化符号、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战略,如湖南有湖湘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江西有赣鄱文化等,作为少数民族密集的贵州也有高原文化,而“多彩贵州”正是这种高原地域文化表征的高度概括。从政府决策层面看,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彩贵州”话语的传播与宣扬,不仅明确将其提升为贵州文化产业的品牌形象,而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多彩贵州”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以壮其声威。但是,对于“多彩贵州”的概念意涵的具体所指与理论建构,尤其是从文化学角度对其加以

翔实的理论阐释与坚实的学术支撑的,贵州学界罕有专著面世,蔡熙的《多彩贵州的文化蕴含研究》一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全面系统地对“多彩贵州”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发掘与学理探究,必将产生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效应,为贵州省政府的文化战略提供决策依据。此书对于贵州地域文化的理论概括与思想建构,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 贵州文化的异质性

贵州文化之所以在中国的区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竞争优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在贵州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文化生态中所产生的不

可复制、不可替代的文化,亦即它具有异质性品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异质性的特点,既没有造成贵州本土文化资源与其他地域文化资源的同质化危机,也没有导致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与紧张。恰恰相反,这种异质性资源的价值,不在于用它来确证精英文化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从另一种视角和立场来反省和矫正其他地域文化的偏差。蔡熙主要从石头文化和山地文化入手,展开了对于贵州文化异质性的理解与阐释。

众所周知,贵州的自然景观类型丰富,千姿百态,如何合乎文化逻辑地梳理出自然景观背后的内在线索,从而整合杂然无序、毫无章法的自然景观,很能看出著者的学术功力。作者规避了贵州以黔山秀水景观殊胜的俗见,独到地发掘并拈出石头文化景观乃揭窠贵州文化府库之任督经脉与核心密码的洞见。蔡熙认为,多彩贵州的逻辑基点是石头,因为石头是构建绿色喀斯特王国的基本单位,而瀑布、溶洞、峡谷、关隘,乃至至于韭菜坪的万亩石林和茂兰的石头森林,它们之间也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都是天然化成的各种形态、各种境况的石头书写的文本形式。石头文化,不仅对于贵州的物质文化景观之形成与命名的作用甚大,而且对于构建它的精神文化景观起着重要的连接与贯穿作用。贵州的洞居、洞葬、石头建筑、崖书、崖画、摩崖造像、石塔、牌坊、墓碑、寺庙,都与石头本身的材质纹理以及人类的艺术创造相关。以石头为物质载体,构建管理民族事务的意识形态,如瑶族的“石碑”制度、水族的“洞”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亦是对石头文化景观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书写。

二 贵州文化的多元性

对于贵州文化多元性的特质,蔡熙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爬梳的基础上,用了全书逾半的篇幅来加以翔实的描述与论证。概括来讲,贵州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包括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是文化起源的多元性。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文化或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多元的,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生态。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民族传统不同,其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

展状况不同,这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从地球生命的源头看,它是复数的、多元的,贵州高原的武陵山脉及其紧邻地区的黔东剑河、台江渝东黔江和湘西的沅水流域,也是世界古生物的摇篮和世界最早的生物基因库。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家族谱系,不仅有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其实也包括贵州的早期人类。无论是在旧石器时代,还是在新石器时代,贵州都留存有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与遗址,有“桐梓人”“兴义人”“水城人”等居住,已形成“观音洞文化”“鸡公山文化”等文化样态。

其次是历史文化的多元性。蔡熙挑选了贵州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几种典型文化形态,包括春秋战国时的夜郎文化、元朝的土司文化、明朝的屯堡文化、明朝的阳明文化、现代的长征文化等,而无论是哪一种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都带有多元性的文化杂糅的特质。从民族学意义上来观察,夜郎文化,并非仅仅是某个单一民族所创造的,而是以夜郎民族为主体,包括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地方少数民族(如濮人、越人、羌人、楚人、蜀人、巴人等)融合共生、综合缔造的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土司文化,并非完全土生土长的文化形态,而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地方土司权力下放的高度自治的政治制度。屯堡文化,是明代的汉族向贵州的军事移民所形成的文化,既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遗存,也有贵州地域文化的意涵与质素。阳明心学,虽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创新与重大转向,但是其悟道的触发之所却肇始于贵州的龙场。

最后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众所周知,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贵州的地域文化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和核心,同时还涵盖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系统。各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服饰、居住建筑、饮食习惯、生产习俗、节庆活动、婚姻习俗、文学艺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方面创造了各自的灿烂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如安顺的文庙、西江的千户苗寨、布依族的“六月六”节日、侗族的大歌、水族的水书以及马尾绣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其多元性的重要表征。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分布,既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对其他民族文化加以冲撞、涵纳,这使得贵州的17个民族的文化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正因为贵州民族

文化是朝向异质性的多种可能性开放的,因而,贵州文化并不是单数的地域文化,而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在的特色文化。

三 贵州文化的反思性

值得注意的是,“多彩贵州”虽兼具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双重特点,但是作为文化的贵州与作为经济的贵州之间却存在一个吊诡的分裂现象:一方面,在中国地域文化的百花园里,贵州文化异彩纷呈、异质多元、异趣别具;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大格局中,贵州经济却处于落后位置。换言之,多彩的贵州文化优势资源并没有为贵州的经济增长带来核心增长极的繁荣。对此,蔡熙表现了一个卓越的文化学者所应该具有的反思性品格,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既是他为文伊始就思考的焦点问题,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重要命题。

一方面,贵州文化确实具有边缘性特点,但是对于这种边缘性可以进行新的意义反思与价值重估。蔡熙承认:“与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相比,贵州文化因为所处的边缘位置而具有其自身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其影响力、辐射力、扩张力相对较略”^[1]。从地缘区位来看,贵州地处边陲,多山多石,气候阴湿,偏僻蔽塞,距离中原甚远,因而,贵州经济在全国经济中较为落后,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但是,这种边缘性的区位处境与行政划分,并不意味着贵州就乏文化可循,也不意味着贵州文化就无优势可言。如前所述,多山多石,这并非贵州文化的劣势,相反地,由于它避开了同质性或均质性,这是贵州文化的异质性与多元性的边缘优势所在,其与中心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距离与互动,恰恰给整个中国文化带来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贵州文化

的文化景观虽然如数家珍,但是对于这种地域文化的精神蕴含与核心价值的研究却较少,也缺乏对贵州文化的文化传播、文化扩散、文化交流、文化传承与文化保护,尤其是从旅游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多元异质的文化资源进行动态开发与现代性转换,从而在文化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进行深入的研究。蔡熙认识到,如果一种地域文化完全单向度地强调地方性或地域性,与其他文化形态没有通约性,那么,这种地方性或地域性的文化只能是静态的、幽闭的、遗产的存在状态。贵州文化既是异质性的,同时也是多元性的,而这种多元性足以说明它具备一种开放性趋向的特质,或者说,贵州文化虽是地域文化,却并不是幽闭的、没有通约性的或公共性的文化,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地域文化。这种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既要坚守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文化规定性的特质,同时又考虑到受众的心理需求与期待结构,做一定的文化调适与现代性的转换,这样就能更好地将贵州文化推向中国乃至世界。蔡熙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为例,为贵州文化资源的现代传播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即要多视角、多渠道、多手段提炼、传播与推广亚鲁王文化文本与文化符号,构建贵州苗族的亚鲁王文化创意产业,从而带来丰润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 [1] 蔡熙. 多彩贵州的文化蕴含研究[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23.

责任编辑: 黄声波